

《東華漢學》第 39 期；121-14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4 年 6 月

牛李黨爭與杜牧的政治立場*

朱錦雄**

【摘要】

晚唐以文人為主體的「牛李黨爭」所帶來的政治影響，杜牧也很難完全置身事外。而杜牧究竟為牛黨、李黨抑或無黨，常為後世爭論之焦點。的確，杜牧初入仕途時，曾受到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的照顧、提攜，所以自然容易被歸類於牛黨。但杜牧卻在會昌年間上書李德裕，提供如何討伐劉稹、防禦回紇及平定江賊三事之策，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才會引起了後世諸多的討論。

本文認為，由於杜牧一生著重於「兵事」，對於藩鎮問題，始終主張討伐，絕不姑息，故屢屢上書，期望李德裕能發揮影響力，慎重其事。由此可見，杜牧並不在意黨爭，而只在乎國家政策是否走在其認為的理想道路上。

而在政治立場上，杜牧在會昌年間之前，並無參與黨爭之意，而兩黨掌權之核心人物，亦無將其視為黨內同志對待。然而，自會昌二年至

* 本文為 108 年度科技部計畫〈晚唐政治情勢與杜牧心態變化的關係（MOST 108-2410-H-126-011）〉部份成果。

**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大中二年，無論是李德裕還是白敏中在朝中掌權，杜牧都只能過著輾轉於三任下州刺史的生活。仕途之路的不順遂，終究影響了杜牧的心態。久而久之，原本超越黨派的立場難免有所動搖。杜牧在人生的後段對於李德裕評價產生轉變，其實有跡可尋的，實肇因於仕途之不順，才不得不向黨爭之勝者低頭。

關鍵詞：杜牧、牛李黨爭、政治立場、李德裕、牛僧孺

一、前言

晚唐的政治情勢十分的複雜，其中，以文人為主體的政治黨爭——「牛李黨爭」所帶來的政治影響，使所有進入仕途的文人，幾乎很難完全置身事外。這從唐文宗面對「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的情形，而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¹的感慨，不難窺見。面對這種情形，文人往往只能隨著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載浮載沉。傅璇琮和傅錫壬曾以「牛李黨爭」為視角，討論其如何影響晚唐文人的仕宦之途：

牛李黨爭對於當時的文學也有很大的影響，尤其與當時一些作家的政治態度和身世遭遇，更直接有關。（傅璇琮〈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研究〉）²

唐代歷時四十餘年之久的「牛李黨爭」，是一件震撼當代的大事，引起了多少文士悲歡離合的際遇；或被同黨拔擢時的喜悅，或遭異黨貶斥時的悲苦，或因曲解而憤怒填膺，或對政敵之切齒仇視。（傅錫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³

即使自身可能無意於依附得勢之權貴，卻也難以避免被捲入黨爭之紛擾中。由於後世文人學者在看待這段歷史時，彷彿晚唐的文人必定為其中一邊，處於中立者極少，若是交遊涉及兩黨之人，則容易被視為投機取巧者。最有名的例子當屬李商隱。在兩《唐書》的本傳中，李商隱被批評為「無持操，恃才詭激，為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⁴、「牛、

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唐紀六十一·文宗太和八年（834）〉（臺北：世界書局，1972），頁 7899。

² 傅璇琮，〈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研究〉，《唐詩論學叢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 166。

³ 傅錫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4），頁 121。

⁴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296。

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笄之」⁵，這很明顯是從黨爭的角度進行評價，而這種說法直至清代以前，都沒有太大的改變。相較之下，杜牧雖沒有遭受如此強烈的批評，但因為他與兩黨的代表性人物——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密切的關係，這種看起來在兩黨之間游移不定的舉動，自然也容易使近代學者從黨爭的角度，評價其行為及心態，並尋求其背後的原因。例如：吳在慶便從個人情緒的角度解釋：

我們認為杜牧因與牛黨有很深的人事關係，又受到李黨的排斥，逐漸產生怨恨李黨的情緒。因此在接近晚年時，他明顯地偏向牛黨。⁶

趙玄覽認同吳在慶的觀點，而較為深入的延續此說：

儘管他在宦官、藩鎮、邊防、佛教等重要政治問題上與李德裕見解相似，最後卻因個人政治生命受到壓抑而投向牛黨，並選擇在李黨垮台的大中初年發洩忿恨情緒。……杜牧對政治形勢頗為敏感，但有時會為個人意氣所囿……杜牧始終對自己充滿了自信，在心理失衡後偏向於外歸因，將矛頭毫不猶豫地指向了李德裕。⁷

楊栩生則認為杜牧的所作所為，純粹只是對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觀其杜牧在牛李黨爭中的依違的變化，其趨捨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合於自己、有利於自己，能寄予希望者則趨之，否則則捨之。⁸

無論從個人情緒或政治利益來解讀杜牧這種游移兩端的行為，雖然都具有其內在的邏輯性，但《新唐書》記載杜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

⁵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479-1480。

⁶ 吳在慶，《杜牧論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頁151。

⁷ 趙玄覽，《李商隱杜牧政治詩及政治態度比較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頁44。

⁸ 楊栩生，〈牛李黨爭中的杜牧其人〉，《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四卷第3期（2005.6），頁51-52。

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⁹，似乎不是個容易被自身情緒影響或考量政治利益之人，這也與上述諸家之論呈現某些矛盾。事實上，一個人的政治之路，有時很難如此單純的解讀，在政治生涯中所遇到的多變處境，往往使得文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應對的方式。這可能涉及到了當下政治情勢的判讀，以及原本就存在於自身的理想價值與性格等種種因素，甚至還可能同時混合了不同的因素。因此，要討論杜牧心態的變化，就必須以杜牧在仕宦之途的遭遇、當時的政治背景以及個人處境因素等為切入點，觀察杜牧如何看待這些事件、現象、處境，並提出什麼樣的言論觀點，或是表現出什麼樣的行為舉動，作為判斷其當時心態的依據。如此，較能避免以單一的刻板印象來解釋杜牧的各種行為與言論，並且可以更為深入的理解杜牧的內心世界。是故，本文即以此觀點為主，嘗試理解杜牧在牛李黨爭下，仕途之路的變化與抉擇。

二、杜牧與「牛」「李」兩黨之關係

學界關於「牛李黨爭」的研究著作，不計其數，雖然有些地方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對於整體黨爭的發展、演變、影響，以及兩黨的主要成員，已有基本的共識。至於杜牧與「牛」「李」兩黨之關係，經胡可先整理目前的研究後，大致可分為三類：1、杜牧屬牛黨說；2、杜牧屬李黨說；3、杜牧無黨說。¹⁰這個分類結果十分有趣，因為按照傳統的說法，牛黨與李黨應分屬政治光譜的兩端，若依據文人的行為言論，應該可以判別出其自我認同為牛黨、李黨或兩黨皆非，三擇一的結論，但研究杜牧所屬黨派的論述，竟然三種觀點皆有，頗為特殊。而眾說紛紜的現象，也代表著杜牧在一些行為及言論上，的確有著令人難以理解

⁹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杜牧傳〉，頁1305。

¹⁰ 詳見胡可先，《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384-386。

之處。因此，即便就數量上，秉持杜牧無黨或無黨爭意願，是被迫捲入黨爭的觀點較多，但近代也逐漸出現認為杜牧依違於兩黨之間的批評。

以目前所熟知的杜牧生平來說，初入仕途時，因為在淮南節度使幕下，受到牛黨核心人物牛僧孺的照顧與提攜，所以自然容易被歸類於牛黨。兩人或許於大和四年（830）即已相識，杜牧有〈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

六年仁政謳歌去，柳繞春堤處處聞。¹¹

此詩繆鉞《杜牧年譜》認為「當是本年牛僧孺由江夏入相時寄贈之作」，故繫年於大和四年（830），當時杜牧正在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幕中，任江西團練巡官。¹²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亦認同此說。¹³如果此詩的編年無誤，則杜牧在入牛僧孺幕之前，已與其有往來。以一位初入仕途的低階幕僚，卻能與朝中頗具威望的高官交遊，可約略見出牛僧孺對於杜牧的好感，並不始於淮南節度使時期。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牛僧孺會同意沈傳師的推薦，接受杜牧入其幕下，¹⁴以及之後在掌書記任內對於杜牧的愛護與提攜。¹⁵賴瑞和認為：

中晚唐的基層文官當中，最成功、入仕條件最好的，是一個進士出身，又考中制科或博學宏詞者。他往往先在京城任校書郎，然後通過他父執輩的世交關係，被某個相熟的節度使或觀察使，辟為掌書記（最佳）、或推官或巡官（其次）。

¹¹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23。

¹² 繆鉞，《杜牧傳·杜牧年譜》（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 141。

¹³ 傅錫壬則認為是寫在會昌元年（841）。參見氏著，《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頁 272。

¹⁴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某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737。

¹⁵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三，〈杜牧〉：「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槩達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宋·李昉，《太平廣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1045-60。

幕職不是一種正規的「官」，而是一種「職」，所以幕職不宜長期擔任（參照李商隱、符載等人的官運）。他最好年輕時任巡官、推官或掌書記一兩任後，就隨府主入朝，或由府主推薦，回到中央任監察御史、拾遺等中層官職，再由此遷轉到員外郎、郎中、侍郎等更高層官職。¹⁶

賴瑞和提出的入仕最佳途徑，幾乎就是杜牧的寫照。杜牧在大和二年（828）三月釋褐為弘文館校書郎後，約6至7個月即入沈傳師幕，仕途可謂一帆風順。但直至大和七年（833）沈傳師入朝為吏部侍郎，在其幕下約5年，任內不僅沒有獲得沈傳師的推薦，也沒有隨其一同入朝為官。一直到轉入牛僧孺之幕後，不僅辟為幕僚職級最高之掌書記，更在入幕2年間，於大和九年（835）入朝拜為監察御史。如此之變化，若要說完全無幕主牛僧孺之引薦提拔，似乎難以解釋。由此可以看出牛僧孺在杜牧仕宦路途上的關鍵地位。那麼杜牧一生皆感謝、讚賞牛僧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當牛僧孺於大中二年（848）冬天病逝後，杜牧也於隔年寫了〈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雖然此文常被後人視為溢美之辭，卻顯示了杜牧對於牛僧孺知遇之恩的感激。

如此看來，將與牛黨核心人物牛僧孺淵源頗深的杜牧，視為牛黨一員，似乎不無道理。但在武宗會昌年間，杜牧被外放為黃州、池州刺史時，又寫了〈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會昌二年，843）、〈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會昌四年，844），以及〈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會昌五年，845）給朝中掌權的李黨核心人物李德裕，提供如何討伐劉稹、防禦回紇及平定江賊三事之策。與李德裕相同的政治理念，不僅成為部分學者視杜牧為李黨的理由（見前引胡可先之整理），也引發後世的許多爭論。

¹⁶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313、314。

現代有不少學者為杜牧辯解，例如，傅錫壬提出兩層原因解釋：1、杜牧本來就胸懷大志；2、李家對杜家（指杜牧之弟杜顓）曾有提攜之恩，杜牧之獻策，可能也有報恩的心意。¹⁷吳在慶則認為：

（杜牧）儘管受李黨所斥，也能摒棄私怨，以國家為重……這種去私怨而熱心報國的熱忱，正是杜牧高於陷入黨爭不可自拔的時人的地方。¹⁸

兩人主要從報國、胸懷大志以及李德裕對杜顓知遇之恩的觀點，來解釋杜牧上書李德裕之行為，十分合理。不過，這樣的說法，卻又無法解釋杜牧之後在大中年間批評李德裕的言論，例如：大中三年（849），杜牧任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時，所寫的〈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認為李德裕迫害牛僧孺，而且於會昌年間「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¹⁹又如大中五年（851）七月，杜牧在擔任湖州刺史時所寫的〈祭周相公文〉中，大力抨擊李德裕，並認為自己在會昌年間自京官外放，即是李德裕所為。²⁰這些言論與前述〈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所言：「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²¹的態度，截然不同；尤其「多逐良善」一語，已明顯將自己和李德裕分屬為善惡兩端。傅璇琮便認為：

杜牧書（指〈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中對德裕為相，頗有稱頌……杜牧對於驅除回鶻烏介侵擾對於此時討伐澤潞的贊頌也符合於當時的實際，這些都完全與他在大中年間對德裕的攻訐不同。杜牧此處自稱「某受恩最深」，而大中時卻又稱他之出守黃州是李德裕排擠的結果，前後竟判若兩人。²²

¹⁷ 傅錫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頁 274-276。

¹⁸ 吳在慶，《杜牧論稿》，頁 149。

¹⁹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701。

²⁰ 〈祭周相公文〉：「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忿忍陰汗，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中。」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909。

²¹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821。

²² 傅璇琮，《李德裕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383。

前後對照，杜牧確實「判若兩人」。然而，若是重新思考杜牧當下的處境，並以此來推敲其想法，那麼這些看似矛盾的行為，或許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釋了。

首先，為何杜牧在會昌年間會上書李德裕？這其實與杜牧的治國理念有很深的關係。因為杜牧非常注重「兵事」，一生皆關注藩鎮問題，並逐漸擴至外患問題。²³特別是藩鎮問題，杜牧始終主張討伐，絕不姑息的處理方式。以此角度來解釋，就不難理解其上書給李德裕的心態了。尤其杜牧早在開成三年（838）就曾寫〈上淮南李相公狀〉，給當時被外放為淮南節度使的李德裕，談論朝廷的「兵事」政策。²⁴由此可以看出杜牧，並不在意黨爭，並不在意李德裕是否刻意排擠自己，而只在乎國家政策是否走在其認為的理想道路上，故期望李德裕能發揮影響力，促使朝廷慎重其事。即便在處理藩鎮與外患的問題上，與其恩人牛僧孺以消極、安撫的立場明顯不同，杜牧也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的立場。繆鉞就認為：

杜牧很感激牛僧孺，但是在政治主張上，並不附和牛僧孺姑息藩鎮的政策，這也說明杜牧不以私情影響公文。²⁵

²³ 杜牧〈注孫子序〉：「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又〈上知己文章啟〉：「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784-784、頁 998。其他相關作品尚有：〈上周相公書〉、〈燕將錄〉、〈感懷詩一首〉（時滄州用兵）、〈罪言〉、〈戰論〉、〈守論〉等，皆可看出杜牧所重為藩鎮與兵事；外患部分，可見其〈河湟〉、〈史將軍〉、〈雪中書懷〉等詩。詳細論述可參見朱錦雄，〈從「藩鎮」到「外患」——論杜牧以「兵」治國的理想藍圖〉，《輔仁中文學報》第 54 期（2022.6），頁 41-67。

²⁴ 〈上淮南李相公狀〉：「伏料窮邊絕塞，將議息兵，宣室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987。

²⁵ 繆鉞，《杜牧傳》，《杜牧傳·杜牧年譜》，頁 94。

值得一提的是，杜牧雖在國家政策上與牛僧孺立場相反，甚至還曾上書給與牛僧孺處敵對立場的李德裕，以求實現自己的治國理念，但雙方卻也不因此交惡，這自然是牛僧孺的度量，恐怕也是杜牧由衷感謝牛僧孺的原因之一。

至於在大中年間，為何又會突然出現批評李德裕之論，這就與杜牧在政治立場上的轉變有關了。

三、杜牧政治立場的轉變——連續三任下州刺史的影響

政治立場是判斷杜牧究竟歸屬於哪一黨的關鍵因素。以此來說，雖然杜牧初入仕途便與牛僧孺有很深厚的關係，但至少在會昌年間之前，杜牧很可能沒有將自己視為牛黨成員，並將李德裕視為敵對陣營的想法。其理由至少有三點：

第一，杜牧在李德裕掌權之時，先是在會昌二年（842）從比部員外郎，兼史館修撰之職，外放為黃州刺史，接著會昌四年（844）又遷為池州刺史，就官品而言雖然上升，不過黃州、池州當時皆屬窮僻之下州，連續兩任皆為下州的刺史，仕途實不能算順遂。但杜牧此時卻未大力攻訐李德裕，反而不斷上書提供建議。即使到了會昌六年（846）四月，李德裕遭到宣宗罷相而失勢後，杜牧寫了〈上白相公啟〉給剛剛拜相之牛黨成員白敏中，欲以一片逢迎之詞請求提拔，但內容卻沒有攻訐李德裕，²⁶可見杜牧並沒有仇視李德裕而欲劃清界線。

²⁶ 〈上白相公啟〉：「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公之德……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顛顛萬方，實懸斯望。某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之至。」《杜牧集繫年校注》，頁978。

第二，杜牧在大和二年（828）進士試的座主為禮部侍郎崔郾，²⁷開成二年（837）任宣州團練判官之幕職，其幕主為宣歙觀察史崔郾，崔郾與崔郾為兄弟，依唐代座主與門生、²⁸幕主與幕僚的關係，杜牧理應和崔氏兄弟交情匪淺，而崔氏兄弟又與李德裕頗有往來，²⁹基於這層關係，杜牧不覺自己為牛黨成員，亦為合理。

第三，大和八年（834）11月，李德裕出為鎮海節度使，辟杜牧之弟杜顥為巡官、試協律郎。開成二年（837）春，李德裕為淮南節度使，復闢杜顥為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³⁰這兩次徵聘，杜牧不但未出言反對，反而還寫詩鼓勵杜顥，³¹也沒有勸說杜顥接受時任淮南節度使牛僧孺之徵聘。³²依杜氏兄弟的情感，若杜牧自覺為牛黨，則杜牧不僅應勸

²⁷ 宋·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杜牧〉：「初未第，來東都，時主司侍郎為崔郾，太學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君選才，僕敢不薄施塵露。向偶見文士十數輩，揚眉抵掌，共讀一卷文書，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摺笏朗誦之，郾大加賞。曰：『請公與狀頭！』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請第五人。更否，則請以賦見還！』辭容激厲。郾曰：『諸生多言牧疏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94-195。

²⁸ 傅璇琮：「唐代的這種座主與門生的關係，發展成一種新的官僚勢力互相依存與接合的關係。」《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8月），頁253。李昱東：「凡掌貢舉之主司，皆稱為座主。座主與門生，本來只是一種禮儀上的名份關係，後來卻形成了報恩的具體內容，他們感謝的是座主的賞賜和提拔，使他們進入清官的行列，可以迅速高升，作為參加科考的歸宿。這主要的是主司有很大的決定權，才成為門生頌揚的對象，並形成特定的關係。」〈唐代科舉制度的演進〉，《空大人文學報》第19期（2010.12），頁201。

²⁹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崔郾傳〉：「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郾弟兄素善。」頁1056。

³⁰ 參見杜牧，〈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751-752。

³¹ 杜牧〈送杜顥赴潤州幕〉：「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欄不覺深。直道事人男子業，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理韋弦佩，莫獨矜誇玳瑁簪。若去上元懷古處，謝安墳下與沉吟。」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1278。

³² 杜牧〈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丞相奇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己。』」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751。

阻杜顓入李德裕之幕，轉投牛僧孺，而杜顓在接受李德裕之聘時，也多少該有些忌憚才是。

從另一角度來看，會昌年間牛黨的核心人物是否將杜牧視為同黨，也值得思考。《舊唐書·馬植傳》記載：

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³³

前面曾提及李德裕於會昌六年四月罷相後，常被視為黨爭後期牛黨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白敏中（792-861）緊接著於五月拜相。杜牧也順勢上書白敏中以期獲得重用，然事與願違，杜牧不但沒有回中央任官，反而在會昌六年（846）九月再遷為同屬下州的睦州刺史。³⁴如果牛黨掌權之核心人物視杜牧為同黨，則即使不將其調回中央，也不該再持續擔任下州刺史，這也約略可以看出杜牧在部分牛黨人物心中的地位。

由此可見，杜牧在會昌年間之前，並無參與黨爭之意，而牛李兩黨掌權之核心人物，亦無將其視為黨內同志對待。

調任睦州刺史一職，對杜牧造成了很大的打擊，產生了強烈的失落情緒。許多文章皆可看出當時杜牧之心情：

人惟樸樛，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換星霜，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弔影自傷，向隅獨泣。將欲漁釣一壑，棲遲一丘，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難循，進退唯艱，憤悱無告。（〈上吏部高尚書狀〉）

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上周相公啟〉）

黃岡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棲在孤島。僻左五歲，遭逢聖明。

³³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馬植傳〉，頁1168。

³⁴ 若依據《新唐書》記載，則睦州為上州，參見《新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五〉，頁289；然而繆鉞依《元和郡縣圖志》元和戶數的記載，認為在杜牧擔任刺史時恐已為下州，參見《杜牧傳·杜牧年譜》，頁88；賴瑞和亦有相同說法，參見《唐代高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358。

收拾冤沉，誅破罪惡。牧於此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

曲屈越嶂，如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才千餘家。

夜有哭烏，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喑偪塞，行少卧多。

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棄，其道益艱。（〈祭周相公文〉）³⁵
有別於前面兩任刺史時期，杜牧在睦州刺史任內，不僅出現上述這類刻意渲染睦州悲苦生活之文，也開始出現許多失意思鄉之詩，例如〈新定途中〉：

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秋。

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³⁶

新定即指睦州，故此詩應為杜牧移任睦州刺史時所作。張文紀即東漢的張綱。張綱剛直敢言，不僅上書反對寵幸放任宦官，也抨擊外戚掌權，危害社稷，最終也受到大將軍梁冀排擠而外放。³⁷首句「無端」、「偶效」之詞，可以感受到原本「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的杜牧，也開始自嘲從前那些不顧後果之舉，才致使自己落得與張綱類似的處境。後兩句尤顯悲涼，杜牧途經年輕時曾待過的繁華江南，想起當時蒙受貴人的提攜，不僅生活風流，後來更是返回

³⁵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988-989、981、909。

³⁶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465。

³⁷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五十六，〈張綱傳〉：「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漢安元年……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冀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頁 478。

中央任職監察御史，前景一片美好；而今卻在外流落五年，無法返回故里，更必須要持續往南，前往更遙遠的深山野嶺中，悲戚失意之情，溢於言表。

杜牧在睦州刺史任內還寫了不少這類詩作。如〈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三峰。³⁸

前兩句原本是順應題目來寫睦州八松院的小石，但後兩句卻以小石比喻華山三峰，顯露出對長安的思念之情。可見杜牧流落異鄉的情緒。又如〈朱坡絕句〉三首之一：

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魚書。

賈生辭賦恨流落，祇向長沙住歲餘。³⁹

杜牧自比賈誼，除了有受讒言而遭排擠之不遇感外，更顯露出連續三任皆為下州刺史而不見中央召回，已比賈誼流落在外還久之悲嘆。此外，〈憶遊朱坡四韻〉亦有「如今歸不得，自戴望天盆」之句，⁴⁰明顯感受到杜牧長期流落在外，不得歸家之失落感。

大中二年（848），杜牧終於在宰相周墀的援引下，內擢為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即使如此，在離開睦州返回京城時，仍有「誤曾公觸尾，不敢夜循牆」、「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除官歸京睦州雨霽〉）⁴¹之嘆，明顯是一種對於長期外放至下州，而不斷告誡自己避免重蹈覆轍的語氣。

無論是李黨的李德裕還是牛黨的白敏中在朝中掌權，無論是真切的上書建言或是低聲下氣的逢迎，杜牧都無法改變現況，只能過著輾轉於三任下州刺史的生活，這對一直期望得到機會發揮的杜牧來說，情何以堪。久而久之，年過四十五，而回任中央朝廷之路又看似遙遙無期的情

³⁸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466。

³⁹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292。

⁴⁰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291。

⁴¹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403。

形下，原本超越黨派的立場，難免有所動搖。感到灰心喪志之際，大中二年（848）高元裕的書信慰問，⁴²以及後來周墀的舉薦援引，便成為轉變的契機。一方面高、周二人同屬重新掌權的牛黨，另一方面，造成杜牧外放的始作俑者李德裕，不僅澈底失勢，還在宣宗繼位後的三年多內，從荊南節度使一貶再貶至崖州司戶參軍，並於大中三年（849）卒於崖州，延續近四十年之久的黨爭，也隨之結束。此時，擔心再度外放至荒僻之處的杜牧，也不得不在政治立場上逐漸靠向牛黨，開始表達對於李德裕的厭惡之感。這就能解釋杜牧不滿李德裕之文，為何都在大中三年之後所寫，而且這些文章批判李德裕的力道，也逐漸地由輕轉重。這些批判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中三年至大中四年。

大中三年所寫的〈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主要是為牛僧孺辯護，抬高其地位，故刻意貶低李德裕行為不當；〈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僅點出「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⁴³暗指自己與邢群受到打壓；大中四年〈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也算是為杜顓曾受李德裕賞識之事開脫，故僅指出李德裕「貴驕多過」。⁴⁴

第二階段：大中五年至大中六年。

自大中五年開始，杜牧抨擊的力道開始加強，〈祭周相公文〉「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忿忍陰汙，多逐良善」之說，已全面否定李德裕在會昌年間的政績；⁴⁵大中六年〈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更是藉由李德裕排斥周墀、篡改《元和實錄》以彰顯

⁴² 杜牧〈上吏部高尚書狀〉：「敢望尊嚴，特自褒舉，手示遠降，羈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迸落。」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989。

⁴³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738。

⁴⁴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 1005。

⁴⁵ 方堅銘：「觀杜牧之文（此指祭周相公文），豈僅攻擊李德裕一人，實則全盤否定會昌之政。」《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236。

李德裕的嚴重缺失，⁴⁶這對於重視歷史的杜牧來說，已經是非常嚴重的指責。

由此可知，杜牧在人生的後段，對於李德裕的評價產生轉變，其實是有跡可尋的。實肇因於仕途之不順，才不得不向黨爭之勝者低頭，故不宜逕自以「判若兩人」（前引傅璇琮語）便一語帶過。

四、結論

杜牧在牛李黨爭時的政治立場，常為後世學者爭論之焦點。故本文透過討論杜牧與牛僧孺、杜牧與李德裕的關係，以及杜牧在會昌年間仕途變化的影響，進而得到以下結論：

- （一）雖然杜牧在仕途之初就受到了牛僧孺的提攜，可以順勢站在牛黨的政治立場，為自己後續的仕途鋪路，但在唐武宗會昌年間之前，杜牧應該沒有參與黨爭之意，其理由有三點：
1. 李德裕在會昌六年罷相後，杜牧寫了〈上白相公啟〉給甫拜相之牛黨白敏中乞求提拔，但內容卻沒有攻訐李德裕，可見杜牧並沒有仇視李德裕而欲劃清界線。
 2. 杜牧進士試的座主為崔郾，任職宣州團練判官時之幕主為崔郾，依唐代座主與門生、幕主與幕僚的關係，杜牧理應和崔氏兄弟交情匪淺，而崔氏兄弟又與李德裕頗有往來，或可理解杜牧不覺自己為牛黨成員。
 3. 李德裕曾兩次聘杜牧之弟杜顥為幕僚，杜牧不但未出言反對，反而還寫詩鼓勵杜顥，也沒有勸說杜顥接受牛僧孺之徵聘。若

⁴⁶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撰元和朝實錄四十篇，溢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三十年自名父功，眾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新本。」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頁714。

杜牧自覺為牛黨，則杜牧應勸阻杜顓入李德裕之幕，轉投牛僧孺；另一方面，杜顓在接受李德裕之聘時，也多少該有些忌憚。

對那時的杜牧來說，恐怕更在乎整體國家政策是否走在其認為的理想道路上，也就是以「兵事」治國，消除藩鎮所帶來的禍害。

- (二) 自會昌二年始，杜牧連續三次派任為下州刺史，有近七年的時間沒有回中央任職，可見先後掌權之兩黨核心人物：李德裕和白敏中，並沒有將杜牧視為黨內同志對待。
- (三) 唐宣宗繼位後，李黨雖然失勢，但杜牧卻依舊被派任為下州刺史，原本超越黨派的立場也終於動搖了。雖然李德裕在大中三年卒於崖州，牛李黨爭也隨之結束，但杜牧反而開始在詩文中表達對於李德裕的厭惡之感，這或許是因為往後將面臨一黨專政，擔憂未來的仕途，故不得不在政治立場上逐漸靠向牛黨而產生的行為。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1972。
- 【宋】辛文房，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宋】李昉，《太平廣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方堅銘，《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吳在慶，《杜牧論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
- 胡可先，《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傅錫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4。
-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 傅璇琮，《唐詩論學叢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 傅璇琮，《李德裕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13。
- 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18。
-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20。
- 繆鉞，《杜牧傳·杜牧年譜》。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二) 期刊論文：

朱錦雄，〈從「藩鎮」到「外患」——論杜牧以「兵」治國的理想藍圖〉，
《輔仁中文學報》第54期（2022.6），頁41-67。

李昱東，〈唐代科舉制度的演進〉，《空大人文學報》第19期（2010.12），
頁179-208。

楊栩生，〈牛李黨爭中的杜牧其人〉，《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四
卷第3期（2005.6），頁48-53。

(三) 學位論文：

趙玄覽，《李商隱杜牧政治詩及政治態度比較研究》。蘭州：蘭州大學
碩士論文，2015。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ang, Chien-ming. *The Niu-Li Factional Struggl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Mid to Late Ta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 Chu, Ching-hsiung. "From 'Fanzhen' to 'Foreign Threats'—A Discussion on Du Mu's Ideal Blueprin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with Military". *Fu Jen Chinese Studies*, Issue 54 (June 2002), pp. 41-67.
- Wu, Zai-ching. *Essays on Du Mu*.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Hu, Ke-xia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Literary Studies of the Tang Dynasty*.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u, Zai-ching. *Collected Annotations and Chronology of Du M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 Fu, Xi-ren. *The Niu-Li Factional Struggles and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Taipei: East Great Books Co., Ltd., 1984.
- Fu, Xuan-cong. *Ta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Literature*. Taipei: Wen Shi Zhe Publishing House, 1994.
- Zhao, Xuan-l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oetr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of Li Shangyin and Du Mu*.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2015.
- Lai, Ruihe. *Local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20.
- Miao, Yue. *Biography of Du Mu • Chronology of Du Mu's Life*. Hebei: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

The Niu-Li Faction Struggle and Du Mu's Political Position

Chin-Hsiung Chu*

Abstract

Du Mu could not stay out of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brought about by the “Niu-Li Party Struggle” with literati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hether Du Mu is a Niu party, a Li party, or a non-party is often the focus of debate in later generations. Indeed, when Du Mu first entered his official career, he was taken care of by Niu Sengru, so he was easily classified as a bull party. However,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Du Mu wrote to Li Deyu to provide suggestions during the Huichang period, which has aroused many discussions in later generation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because Du Mu focused on “military affair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always advocated crusade against warlords, so he wrote letters many times, hoping that Li Deyu would exert influence.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that Du Mu does not care about party disputes, but only cares about whether the national policy is on the ideal path he believes.

In terms of political stance, not only before the Huichang period, Du Mu had no inten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party disputes, but also the figures in power of the two parties did not treat them as comrades in the party.

Whether Li Deyu or Bai Minzhong was in power in the court, Du Mu could not enter the central court. The unsatisfactory career path finally affected Du Mu's mentality. Over time, the original position of transcending party will inevitably be shaken. In the latter part of his life, Du Mu's evaluation of Li Deyu changed. In fact, there are traces to be found. It i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because of the failure of his official career that he had to succumb to the winner of the party struggle.

Keywords: Du Mu, Niu - Li Party Struggle, Political Standing, Li Deyu, Niu Sengru